



在寂静中聆听心的跳动

——2010年短篇儿童文学创作漫议

□朱效文

有好多年了,儿童文学中的短篇作品受人们关注的程度,远不及长篇文学作品。上世纪80年代人们争相议论短篇少年小说和短篇童话的热闹场景,仿佛一去不复返了。幸好有几家执著的儿童文学期刊依然在那里坚守,有很多年轻的和不太年轻的作者依然在痴痴地写着短篇,而毫不在意是否会被“重视”。其实儿童的阅读总是从短篇开始的。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最多的一定是短篇。对作者而言,短篇也是最难写的,是付出最多、报酬最少的。对短篇文学作品的冷落,其实并不公平。

由于职业的原因,我经常阅读较多的短篇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和短篇童话。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我仿佛身边总是坐着孩子,我是在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一齐分享阅读的快乐。因为这些作品都是为孩子们写的。我只有顾及到他们的感受,我的评判才会是正确的。当我沉浸在孩子般的阅读心态里,我阅读的感觉就无比的幸福。

2010年间,我视野中的短篇儿童小说创作,仿佛是伴随着作者视线的悄然转变开始的。小说作者们目光关注的焦点,渐渐地由莺歌燕舞的校园、灯红酒绿的城市转向乡村,转向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转向城市儿童中的弱势群体、残疾儿童,转向曾经被我们漠视、遗忘,急需要我们关爱的那一群逆境中的孩子们。老臣的小说《开往秋天的地铁》(《儿童文学》下)2010年7月号)描写了城市流浪乞讨儿童独特而微妙的心态,并赋予他们一个转变的契机。贾颖的小说《我的同桌叫太阳》(《儿童文学》下)2010年12月号)塑造了一个拥有阳光般个性的农民工的孩子;那支又破又旧的竹笛如同一个意象,折射出漂泊中的孩子丰富的性格内涵。吴洲星的小说《老潘》(《儿童文学》上)2010年1月号)生动细腻地刻画了处于困境中的城市下岗工人的孩子,与父辈之间由对抗走向和解的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这类作品中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薛涛的《护林员的春天》,浅浅浅的《乔桂芳,你也曾经这么瘦》《傻子阿洛》等。

并不是前几年没有这类作品问世,而是2010年间这类题材作品的涌现,呈现一种喷发的态势。而它的出现,既没有行政

命令,也不靠文件指示,而是作家们自觉的转身。他们或许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自己创作中某种人文精神的缺失,自觉地进行着一种对创作行为的精心的矫正。儿童文学当然可以表现欢乐,表现甜蜜,表现欢乐中的小忧伤、小纠结;但儿童文学不能忘记最需要人文关怀、最渴望心灵慰藉的那群弱势孩子。关注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既是文学肩负的使命,也是文学的精神之源。也许2010年的这一变化,不仅是创作视野的突破,更是短篇创作在文学境界上的标志性升华。

孩子们的生活大多在校园度过,校园小说无疑是儿童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遗憾的是,在我2010年的阅读中,较少能够读到有益新意、能打动人心的细腻生动的校园小说。是今天的校园已无可写之处了吗?还是我们的作者离开真实的校园太远太远了呢?幸而还有不多的闪光之作。如翌平的小说《选票》(《少年文艺》2010年5月号)用独特的眼光观察和剖析了当下校园中的“竞选”活动,揭示了在孩子们最早的民主生活实践中,金钱与权欲的可怕渗透和良知的觉醒,将不同孩子在选举中的心理变化刻画得细腻而传神。沈石溪的小说《为了让你多看我一眼》(《少年文艺》2010年4月号)将一对由修炼成精的藤制门环变化而成的夫妻和一个小孩之间即将分别时的深情,演绎得委婉曲折,令人肝肠寸断。这是一种“新聊斋”体的写法,也是我近期读到过的最好的民间故事体的童话。

虽然就整体而言,短篇童话创作在趣味性和想象力上明显不足,但却在童话的诗性和童话主题的开拓与创新上有所进取,有所“斩获”,体现了中国童话即便在高潮期依然涌动着的勃发的生命力。如王芳的童话《兔的罐头》(《儿童文学》下)2010年3月号)讲述了兔子家决定天气变化的七只罐头被刺猬不小心弄乱了次序,并且无法恢复,使兔子因不知道天气而惊慌失措的故事。作者巧妙而诗性地告诉读者,“给习惯的生活秩序来点儿变化,也未必是件坏事”;突如其来的变化所带来的,也许是快乐,也许是个机遇呢!兔子的那种慌乱和担心,不也正映照着人类共同的弱点吗?又如唐池子的童话《怪老头的眼睛》(《儿童时代》2010年第7、8期合刊)以诗般的语言,讲述了在一个奇怪的国度里,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擦拭灰尘,所有人的目光里看到的都是令他们感到耻辱的尘埃,他们的心情总是灰暗的。而一个老头使他们改变了这一切。在这老头的眼睛里,这个王国无比的美丽。老头教会了人们怎样看世界,怎样发现美,怎样享受世界的美好。这是一篇寓言体的童话。它的奇妙,就在于用一个荒诞的故事揭示了人们心中常有的一个“病灶”,揭示了人们幸福感缺失的原因。这种蕴含深意,又诗情

和想象力的退潮。中国童话中曾经爆发过的蓬勃的想象力和妙趣横生的表现力似乎已经不多见了。但寂寞中依然有亮点。最突出的是汤汤的童话。汤汤的短篇童话似乎处在一个创作的爆发期,不仅数量多,而且水平均衡,佳作迭出,每每有令人心惊的新构思和新创意。如她的童话《天子是条鱼》(《儿童文学》上)2010年1月号),别出心裁地构思了一个人间的母亲和来自外星球的一条鱼之间的深深的友情,将奇妙的幻想和人间的真情天衣无缝地编织在一起,让读者在感受奇妙和奇趣的同时,也被人间真情深深地打动。又如她的童话《绿藤红藤》(《少年文艺》2010年4月号)将一对由修炼成精的藤制门环变化而成的夫妻和一个小孩之间即将分别时的深情,演绎得委婉曲折,令人肝肠寸断。这是一种“新聊斋”体的写法,也是我近期读到过的最好的民间故事体的童话。

2010年的短篇儿童小说的另一个缺憾是:婉约有余,豪放不足,缺少有力度感的、有阳刚之气的作品,缺少像当年常新港的《独船》《沼泽地上的那棵橡树》那样的小说。儿童小说写得细腻委婉一些、柔美温情一些当然是好的;但如果这类作品一统天下,男孩子们读不到有男子汉精神的有力度的作品,对他们的精神成长肯定是有利的。独生子女家庭环境和激烈的学业竞争导致了当下男孩男性精神的某种缺失,这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能不说是一个隐患。阅读一些富有阳刚之气的儿童文学作品,多少会给予孩子们“缺钙”的心灵补充一些营养。多么希望这样的作品,今后多一些,再多一些。

2010年的短篇童话创作,似乎是寂寞的。就多数作品而言,存在着明显的趣味

荡漾的童话,是短篇童话在2010年的一大收获。

在近期阅读短篇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常常会被一些年轻作者生气盎然的写作所感动。他们的涌现,是中国儿童文学未来的希望。如吴洲星、吴新星姐妹俩清新典雅的小说,陈诗哥梦境般的散文体童话,赵菱激情奔放的小说,两色风景犹如当年“热闹派”趣味的童话,顾抒才华横溢的秘境小说,无不深深吸引着我的视线。新锐的年轻作者其实远不止以上几位,他们的萌芽,是否正预言着一个繁花似锦的明天?

特别可贵的是,在新人迭出的同时,一批卓有成就的知名作家依然在为孩子们孜孜不倦地创作着短篇。我以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不论从市场影响还是从经济报酬而言,写短篇远不如写长篇“效益”更高。2010年里,除沈石溪的《为了让你多看我一眼》《血熊熊》外,我还读到了常新港的《我能有一只唱歌的鸭子吗》、梅子涵的《押送》《乡下路》、薛涛的《小车站》等。从这些精致的作品里,我读到了作家们新的追寻、新的探索,听到了他们永不止息的脚步,他们仍然是当下短篇儿童文学创作的脊梁。其中梅子涵的小说《押送》(《少年文艺》2010年4月号),出人意料地描写了一段过去“动乱年代”里的中学生在今天的心灵自白,不是忏悔,胜似忏悔。那种赤裸的完全不加掩饰的真诚和真切,令人动容!只是不知道今天的孩子能不能读懂他们父辈的这段伤心往事?如果能读懂,能记在心里,他们的明天是不是会更好?

短篇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众多的儿童文学期刊为之提供生存的土壤和展演的平台。幸而有《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上海)、《读友》《少年文艺》(江苏)、《东方少年》《中国校园文学》和《文学少年》等一大批儿童文学期刊能可贵的坚守。尤其是《儿童文学》,她在为孩子们坚守纯洁的文学信念的同时,竟然创造了发行量的奇迹!并且在拓展市场的过程中,文学的立场一步也没有退缩,丝毫也不曾放弃对孩子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值得我尊敬的是,她们用实践证明了,文学艺术是可以被孩子们所喜爱的,优秀的儿童文学也是可以“畅销”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优秀期刊的编者,他们的精神,是儿童文学创作看不见的灵魂。

2010年的短篇儿童文学创作,和长篇作品的喧嚷和鼓噪相比,总体是寂静的。但我更愿意静下心来,聆听只有在这寂静氛围中才能听清的蓬勃的心跳,这心跳来自心无旁骛的虔诚的写作者。它们就像来自天外的鼓声,总是在点燃着希望,预告着未来,迈动着生命最纯真最灵动的脚步。

望,本身是很好的,只是在这个小说里面,希望来得比较奇怪。或者说,希望的根基不是很牢靠。其实,整个故事的逻辑有点像余华的《活着》,表现的是一种活着的本能、生存的本能,比如他们生吃泥鳅,这里没有一个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意志和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提出的希望,难以从虚无中产生。

胡丽娜:我在读《福官》的时候是把它与国外小说《白衣女孩》对照着去看的,作家罗玛·丽哥卡创作的动力来源于《辛德勒的名单》当中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她以一种回忆的笔法写下犹太人的苦难历史。小说有非常多的细节的表现,但《福官》缺少的恰好就是细节,包括对在战争之下人们生活状态的描述。

周晓波:我认为这篇小说存在这么多问题,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作者对长篇叙事的把握不够成熟。一部长篇小说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它的叙事。长篇小说需要在叙事结构、叙事逻辑方面具有很强的严密性。其次是人物的塑造问题,人物是否立得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长篇小说中,哪些人物是中心人物,哪些是次要人物,都是需要作家认真考虑的。

蒋风:我觉得毛芦芦选择这个题材进行写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且是有难度的。我觉得现在来写战争题材,让下一代人都能认识到战争的罪恶,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关键是怎么样写的问题。你现在要写战争题材,跟徐光耀写《小兵张嘎》肯定是不同的。今天再写战争题材,主要是应该提高到人性回归的高度,让下一代认识到应该如何做人,而不是再用血淋淋的场面来唤起对战争的厌恶,也不是用更多这样的场面来刺激小孩子的情感。

徐静静:毛芦芦的小说让我想到当下的写实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当前儿童文学创作当中,不仅历史小说的题材匮乏,而且表现当下儿童生活现状的现实小说也很匮乏。在这个写实文学非常缺乏的年代,毛芦芦历史小说的创作方向是非常好的。

方卫平:我希望毛芦芦能够继续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因为这是当代少儿小说创作领域比较缺乏的题材。我觉得这个领域还有很大拓展的空间,我建议你在这方面继续为中国当代少儿小说的发展进行实践和探索,做更多的功课。

毛芦芦:能有这个机会坐在这里我感到非常幸福。听了大家真诚的发言,我内心真的很震撼,你们指出了很多我已知或未曾意识到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创作中,我会把你们这些非常真诚的建议当做警钟,时常敲醒自己。

经过今天的会议之后,我觉得我确实应该非常慎重地去创作。我是个比较感性的人。接下来的创作过程中,我会更理性一些,做更深的思索。

(整理:李作媛、张蕾、石诗瑶、高畅、马健美)

■短讯

刘东成长系列出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丛书最近推出了刘东“青春一线成长系列”,包括纪实文学作品集《轰然作响的记忆》、中短篇小说集《快闪异族》和长篇小说新作《镜宫》。《镜宫》是刘东经过6年的构思、准备而创作出的“魔幻”小说,其指向却是当代少年的生活状态和心灵世界,意在让成长中的青少年更关注自己的成长,更了解生命的意义。张之路称赞这部作品说:“它的主题和内容与当下流行的一些儿童文学相比,显得严峻和复杂,但这是必要的……当我们面对复杂和严峻的课题,儿童又应该涉及的时候,有责任感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拉着孩子们的手帮助他们勇敢地走进生活的大门。而刘东正是这样一位作家。”



第29期

儿童文学评论

■评论

一只游离的眼

□李兆欣

《地铁》这本书,生来就带着困难。

不是因为韩松被看做科幻作家,而科幻小说卖得不好;也不是因为韩松常被称作晦涩——其实其人其文更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直白。《地铁》的困难,在于不易被人接受,在于一只游离在外的眼。

韩松眼神不犀利,甚至在某些时候的镜头下,凝固的表情里眼睛略显无神。那时的他,往往跳脱出眼前的事物,睁开一只我们看不到的眼,将肉身双眼看去已经毫不新奇的世间万象,新鲜地摄入眼底。他似乎倾向于佛教,但你很难说他相信神佛。他笔下的世界有各种信仰,但并不使事情变得更好,或者让某个人获得解脱。“宗教已经像是剧毒和淫猥的蕈类一样,悄然无声地在地底生长了出来。”

在这只眼中,人心的归属毫不重要。正因为无所信仰,进而无所持、无所惧,这只眼看到的东西,让我们惊讶甚而恐慌,及至试图愤怒,这怒气却找不到发泄的对象。韩松的文字也势如火水,带着蒸腾的雾气、巨大的热量和忙乱的嘶嘶声,缓慢地、不可阻挡地,正如同一道平静而通透一切的眼光般,侵入现实外壳的尴尬领域,重新包裹住我们的裸体:“庞大而嵯峨的城市,果冻祭品一般,悬浮在乌油的肮脏灯火之森——却像是一个正在高速飘走的河外星系……胡同遂长,却并不扎实,像是从老母鸡腹中生抽出来的一根柔柔,浊臭黏滑,自然也没有现代工业感……未来像一只瞎眼鸟儿在窗外隐然飞翔,一道蓝色火光在它的翅上闪耀……”明明该到站了,地铁却疾驰不休。车厢里的拥挤,似乎正像肿瘤一般长大,向结束不了的局面发展……”

《地铁》的故事复杂,不是韩松的内心扭曲,如同四层嵌套的克莱因瓶。问题在于我们看世界的两只眼,应当看到简单而直接的世界,但为了善意、恶意以及善恶难辨的意图,被塑造,被遮蔽,被加上滤光镜片,无法成为纯粹的眼。韩松给出一个又一个的谜题,这些没有解答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牵引着书中的每个人物,阻挠他们塑造自己对世界的解释。他们困惑,他们迷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孤注一掷,他们为了爱抛弃生命,他们把皮相看做是爱;在他们的世界中无论如何都始终无法获得解脱。即将退休的老王不小心看到了世界背后的秘密,再加上他那毫不知情的女婿,两个人在与地铁真相相逢的短短时间中,不但一无所知,甚至或主动或被动地失去了想看到的欲望。而到这种欲望再次萌发的时候,世界已经被地铁列车拖拽着,在地下如翻滚过山车般的轨道上,颠三倒四地,拉着小武等几个人穿越了时空,从现代的现实到达了超现实的后世。在这只超然之眼的注视下,地铁、盾构机这些机械,因其藏身地下和力量巨大,获得了某种神性,成为地下各种信仰的终结者和创造者,打开了我们对脚下不了然之物的想象空间。这一空间并不是韩松凭空捏造而来。凡是凭空出现的,终归会归于虚无,如同真空的量子泡沫。《地铁》所凭借的,字面上是多年来的坊间传闻,内里却是我们难以掌握世界的恐慌。无论谁经过那形同梦游的十年,还恍如昨日,睁眼已经到了以比特计量的世纪,都不会相信屏幕上说的是真相,因为他们见过谎言,人形人样,谈笑风生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尤其是韩松,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年人,身在国家消息的主渠道之中,所见所闻又何止呆板的屏幕和那些人形?《地铁》中的恐慌,来自整个社会巨大的情绪之河。静静地蹲下身,捧起一口浑浊的水,这水离了洪流还在兀自激荡,喝下去,写出来。这写出来的是什么新时空?其实根本就是世界最原本的真相!

这道眼光,照亮世界的真相,也没有放过我们,让我们的一相情愿无所遁形。我们认为事情皆是有头有尾,英雄总不会没了下场,群情激昂必能改天换地,坚持真爱也该物有所值。但这不过是小说家语。从头到尾,一字不落,无论悲喜正邪,全都是写在纸上给我们看的。现实总是虎头蛇尾,狗熊穿了斗篷冒充超人,四个人打麻将都会有鬼,以为留念血淋淋的心其实不过是随手捡来的肉块。《地铁》从中间开始,如同闯入马戏团的吹笛少年,带着我们排成一队,在梦游中肆意狂欢。信手拈来的名词,羚羊挂角的比喻,随意点缀的动作,旱地怨舞的情绪,一切都是地下世界的可能之物。

《地铁》一边揭着小说的底,一边编造着自己的虚构世界。这只眼超然,自然也超越自身的限制。韩松一边编造着玄而又玄的故事,一边还在重复着一切都是谎言。他在乎的已经不是故事的走向,逻辑与矛盾早就在一阵阵的高潮中,被巨大的盾构机扯得粉碎,和污糟的血肉混在了一处。他所要体验的,只是撕碎,试图在反复撕碎的过程中,找到某种超越性,超然于万物,满心欢喜地走到下一面墙的脚下,再次尝试翻越。

韩松并不是一个关心物理可能性的作家,他的机械带有神性,他的人物很少思考,他的宇宙是美学和隐喻的。韩松所关心的、所涉及的、所看到的,就是人面对巨大物理世界的恐惧和无助。他的人物都是些狂热的爱好者,总是迷恋某件特殊的东西,对物质有变的爱;他不热爱物理世界,甚至是敌视和对抗。敌人是最了解你的人。这让韩松成了物理世界最好的观察者,观察它的强大和可怕,观察它的混沌和脆弱。韩松说,没有人能理解这个世界,我只是理解面对这个世界的人而已。如是,尽在《地铁》。



刘德华同志逝世

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高级教师刘德华同志,因病于2011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刘德华同志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炮声响起之前》《塞外红蜡》《没有手的乒乓冠军》等数百万字儿童文学作品。

■关注

写作需要更扎实的准备

——关于《福官》的对话



毛芦芦是一位年轻的作家,但她勇敢地推开厚重的历史帷幕,创作了四部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福官》《小城花开》《柳哑子》《绝响》,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历史题材少年小说创作可以探讨的很多话题。

2010年末,浙江师范大学以“尊重艺术、直言不讳”为追求的“红楼儿童文学新作系列研讨会”苛刻的目光

瞄准了毛芦芦的《福官》。

——编者

战争的残酷应该“有度”

钱淑英:读《福官》,我想到日本作家松谷美代子的《两个伊达》《阁楼上的秘密》这两部战争小说,作者并没有特别执迷于在文本中放入现实的情节,而是依靠想象,战争在文本中只是一种远去的背景,但是作品却触及到了现实的深处。所以我觉得对于战争的描写,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把握现场,或者说没有这方面的优势,那种远去的背景式的想象也是一种途径。这方面,中国当代作家张品成的《赤色小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毛芦芦小说中的语言,有很强烈的画面感。但是《福官》中画面感的呈现,像是电影叙事中的慢镜头,缺少一种应有的节奏感,抓不住读者的阅读兴趣。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而且充满华丽的辞藻,但这样的铺陈和描写并没有激发语言中蕴含的能量。所以我认为毛芦芦以后的创作,应该加强语言的提炼,用更简朴的文字和句式带给读者阅读的共鸣。

彭懿:这部作品看完之后给我一种感觉,像纪录片。可是,这部小说太恐怖,画面也很血腥。小说中关于死亡的画面不计其数,腿炸飞了、手剁掉、血肉横飞等,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刺激,作为一本给儿童看的战争小说,我认为过于血腥。

文中对于数字的处理,我觉得还是需要商榷的。《福官》写道:“本来有4万多人的城市,在这场大浩劫中活下来的居民只有133个”,这是确切的数字吗?对于数字,读者都是很敏感的,作者的态度需要更加严谨。

方卫平:在现代史上,衢州是一个有着特殊历史记忆的小城。它曾经被日军数次轰炸,也是细菌战的一个受害地区。毛芦芦作为一个在衢州成长的儿童文学作家,她愿意把自己的文学关怀、创作的目光投向那段历史,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选择和实践。

对于《福官》这本书对历史的呈现,我有一些疑问。少年儿童小说应该怎样从战争的历史当中去提取叙事细节来构筑故事的框架?我认为,毛芦芦对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或许有一个误解或情结——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对生命的涂炭。这种认知导致她在这个作品中,如彭懿所言写到了太多的死亡,太多的肢体横飞和鲜血喷溅。